

2015年散文：

散文创作的势与运

□韩小蕙

散文写作的新领域、新启示

在2015年度中国浩浩荡荡的散文作品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三位非专业作家的作品：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时，散文界的反应相对比较被动，刘亚洲的《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全文9000字，作者从民族精神的角度，分析了中日近现代以来的两场大战：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缘起、发生、走向和结局，得出的结论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源于中国人的“精神”匍匐在地，所以境遇是“悲惨”乃至“非常悲惨”；而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精神”上获得了新生，因而从“坚强”走向了“非常坚强”，直至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日本则恰恰相反，至上世纪40年代战败投降，民族精神遭到重创，“其完整性直到今天也无法恢复”。

特别值得珍视的是刘亚洲在此文中像鲁迅一样直面中国人“国民性”的弱点和黑暗面，并直击其形成原因——“秦代留给我们最坏的遗产是，把思想的对错交给权力评判。汉武帝走得更远。他真的把一个最优秀的中国男人阉割了。这一道深深的刀口，是中国历史特殊的符号，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这是多年来我所听到的最振聋发聩的声音。

葛云松的《在北大法学院2015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是一篇讲演，但我仍一厢情愿地把它看作思想性随笔。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张中行先生总结其一生读书、写作、做学问的经验，曾精辟地一言以蔽之：“思想最重要”。葛云松的这篇讲演以故事开篇徐徐展开，构思精巧、气韵充沛，既吸引人又有说服力。其中最珍贵的是体现中心思想的这句话：“永远不要忘记思考，永远不要丧失思考能力。”葛云松希望大学培育出“坚持专业判断、坚守职业良知，不论为任何人、任何组织的驯服工具”的人，这样有着家国责任感的合格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合格的从业者在今天弥足珍贵。

《父亲是我最崇拜的人》，施一公作为跻身世界高科技行列的自然科学家，在他的专业领域大放夺目光彩。从这篇文字朴实无华的散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人格和精神是怎样慢慢地灌注到儿子的血脉之中的。受“走资派”爷爷的牵连，1969年父亲被迫带着全家6口人下放到河南驻马店贫穷的小郭庄“劳动改造”，在那看不到天日的劫难中，这位伟大的父亲并没有丧

失对美好生活的信心。他“特别认真”地学会了各种农活技能，学会了撒网打鱼，还动手修房子、打家具，给全家老少（后来发展到为全村人）缝纫、理发；还在公社高中教授数学和物理，带领镇机械厂技术人员进行技术革新……可惜这位“无所不能”的父亲遭遇车祸，医院在没交上500块钱押金的情况下见死不救，父亲就这样在不该断裂的生命链条上突然断裂，这成为施一公心中永远的痛。作者毫不掩饰他的纯真，率直地讲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一切，并无比勇敢地大声宣布他“惟一崇拜的人”，不是伟人，不是名人，不是领袖，而是他的父亲。

为什么今年最打动我心的的是这3篇作品？它们能给专业作家什么启示呢？

论文字、结构、美质等技术层面的因素，这些作品并没有那么“专业”、“地道”、“规范”、“漂亮”。但其优势在于，它们是作者旺盛的（或许可以说是全部的）生命储备之后，放开心闸、冲决而出的作品，此即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在我们今天的写作中，这种可贵的沛然之气是越来越稀薄了。人们似乎都活得格局越来越小，节奏却越加迅疾——写作要快，发表要快，出名要快，挣钱要快，买车买房要快，升官晋级评职称要快……这对纯文学的写作是一种很危险的伤害，它的痛点在于，写作已不再是个人最直抒胸臆的倾吐和对人类文明的积累，而变成了立刻就要变现的股票，变成了没有香味的假花，变成了没有蓝天、白云、阳光的雾霾世界。

纯文学写作的执著和新意

当然，我绝不是说对于2015年中国纯文学的散文写作，就没有好作品了。就我看到的一小部分来说，就有一批值得尊敬的执著的散文家，还是在认真调动着他们的生命激情，写出了如下佳作：

一批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散文，禁得起“记忆”这两个字的分量：在由臧小平、郑苏伊等编辑出版的《高唱战歌赴疆场——臧克家抗战诗选选》（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中，一篇篇当年置身第一线的战地特写，呈现出烽火岁月中的真实与悲壮，极具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值得重读。

贺捷生这些年来为我们讲述了不少红色战争故事，她的父亲贺龙、母亲蹇先任都是从战争的血雨腥风中冲杀而来的，是创建共和国的传奇英雄。贺捷生在“九·三”天安门阅兵式上，看

到“雁门关伏击战英雄部队”被安排走在抗战英雄部队的最前面，激动不已，回到家连夜写出“雁门关大捷”的故事：1937年刚刚深入山西腹地十几天的贺龙将军，命令他率领的第358旅第716团深入日军侧后，打了一个大胜仗，两天内毙伤敌军500多人，捷报顷刻间传遍全国，对正面临着严峻形势的中国抗日军民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其他各篇，从描写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大将军（梁衡《麻田有座彭德怀峰》），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田汉、聂耳（许谋清《国歌魂》），到在白色坚持抗日的爱国者（张曼菱《当年的南开，与校长公子》），参加全民抗战的国民党老兵（刘兆林《国殇墓园与倭家》、徐剑《爷爷的抗战》）到普通爱国市民（刘琼《祖父的青春》），都分别从各个角度记述了当年不屈的中国人民以热血、精神和生命抗击日寇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拼贴出了一幅可歌可泣的中国人民抗日英雄图。各篇散文都写得气势如虹，对抗日先辈、尤其是自己参加了抗战的家族先人充满了敬仰之情；而在细节和情节的处理上则小心谨慎、下笔细微，惟恐失去了历史的真实与痛感。

徐刚的《辉煌苦难江河水》既有滔滔滔滔、大江大河之磅礴，又有少年时以小竹筒抓泥鳅的浪漫，说的还是那个沉重的老话题：缺水的中国，被污染的中国河流。在作者急流一般的文字之上，有一颗焦灼的赤子之心。诗一样滚滚的句子加上学者的哲思与书卷气，是徐刚散文的一贯表达，助力他把这时不我待的呼号呈现得更加尖锐，更有感染力。

阿莹的《乐游原下的绝世壁画》以斐然的文字讲述了1300多年前发生在乐游原上的一连串人物和故事。作品写的是名垂青史的大人物唐玄宗、武惠妃，两代为相的韩休、韩混父子等，情节曲折诡谲，堪比侦探和穿越小说。而在这些惊心动魄的讲述背后，是中华艺术瑰宝的灿烂辉煌，是“文物人”对中华文明的悉心守候与保护，还有一连串文物被盗挖、盗卖、被破坏的罪恶与黑幕……当然，作者奉献出的绝不只是轰轰烈烈的故事，全篇最具震撼力的一句话，是他告诫世界的：“原真的环境应是历史遗存最最惬意的状态”。

朱以撒的《洗手》从题目上看是如此的“白”，但越读下去越被吸引，受到感染。作者从“洗手”这个动作出发，写到了下乡插队时为抢饭而不顾及洗手、回城后写文章和写书法之前的虔诚净手，还写到了他为年迈的老母洗手、剪指甲等等

“2015年倏忽过去了，虽有这么多披肝沥胆的努力，但我们还是遭遇了又一次失望。大众狂欢式的微信散文写作已经侵犯到纯文学创作地盘，甚至影响到某些作家的创作心态，作者们不愿去阅读古今中外名著，更不愿深入到生活中去苦熬苦练，有点难度的作品越来越少人问津……”

细节，表达了对真情、对文化器物、对人类文明的尊敬与崇敬之心，让人越看越肃然。

蒙古族散文家鲍尔吉·原野的《四季》是一篇“沛然之气”与诗意双双充盈饱满的佳作。作者以他的才情和诗意句子，将大自然的春夏秋冬描摹得如诗如画，独到细致的感受、新颖奇特的比喻，显示出作者驾驭汉字的功力。

周晓枫的《布偶猫》写了一位名叫小怜的被男友殴打几致残废而又一再甘心受虐的女孩。这样的人物，在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就有，当时我读得亦是震惊不已。周晓枫以她一贯华美的文字，独到惊艳的连串比喻，以及无可奈何的惋惜与解不开的惊讶，留给我们对此人类“魔症”般的关注与诘问。

三位学者型作家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品，读得我心醉神迷：南帆《草书的表情》从欣赏和写作草书入手，写出历代大书法家心灵与人格的同时，也表达了他自己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取向，使人读出了作者的文化积累、文化自觉与文化厚度。彭程的《在母语的屋檐下》以一连串漂亮的文字表达出对“母语”——中国文字的眷恋与热爱，由此触发了他对“母语”现状的深思：一个失去母语的民族是悲哀的，一个忽视母语的民族是危险的，所以，“热爱母语，应该被视为是一个人的职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陈平原的《语文之美和教育之责》从一位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立场，谈到在当下教育越来越功利化的背景下，中华民族一向引为骄傲的“语文之美”越来越遭受忽视乃至歧视的现状，对此，作者给出的药方是：做学生的要读些无用之书，做先生的要讲出语文的美感，当然，这绝不仅仅限于教育界。

其他好作品，还有冯艺的《一个人的国际共运史》，传奇主人公张报在中国、美国、苏联的风云际会中，命运起伏跌宕，93岁的曲折一生映现出了时代、革命和人性的多面性、复杂性，读来令人掩卷长叹，感慨不已。叶梅的《公主海渡》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相对陌生但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元朝的阔阔真公主，她与文成公一样，推动了历史和文明的辉煌。阔阔真公主绕海陆远赴波斯，扛起了天地山海之间的大美。作为女性的叶梅将心比心，以柔婉香馨的小夜曲起笔，徐徐展开，娓娓诉说，到豪迈处而风格一变，奏出雄浑刚烈的交响曲，将这位元朝公主助力王国鼎盛千古佳话，演绎得惟妙惟肖。

从语言的审美表达来说，陈世旭的散文如歌如诗，又于凝练精粹的寥寥数语中爆发出长河落日圆的壮美，让人感受到巍然宏大的历史气象。

散文：提供更丰饶的精神滋养

□纳杨

回望历史、书写当下

2015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家用手中的笔讲述历史，表达对那段历史的思考，为读者提供了多方位了解那段历史的途径。熊育群的《旧年的血泪》揭开关于长沙会战的种种记忆，作者在思考，为什么日本人如此凶残？日本人对那场战争的态度到底是什么？通过搜集相关资料和与日本人交流，尝试在日本民族的文化里寻找答案。陈喜儒的《黑土地的记忆》侧重描绘日军占领东三省后的种种行径。正像作者在文中写到：“日本已战败投降，但他们的罪恶，已经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无法轻易拭去。”许俊文的《父亲的黄昏》重点不是直接写战争，而是写身为普通农民的父亲在亲眼见证17位新四军战士的牺牲并一直坚持守护他们的坟茔的经历，映照出人们对烈士的漠然，值得我们反思。《浴血的墨迹——中国抗战散文选》既收录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等现代文学名家关于抗日战争的散文作品，也收录了铁凝、王充国、赵玫等当代作家纪念抗战的作品。不仅提供了一个感受战争的较全面的文本，更让年轻一代看到祖辈和父辈对那场战争的表述，为思考战争提供了一种侧面参考。

乡村书写是散文创作的一大主题，在记述今日乡村的自然风貌和人情世故的同时，也写出了乡村的变与不变。鲍尔吉·原野的《村庄里》给乡村生活中的场景或物件画了一幅幅素描，水井、母亲手里的针、马灯、磨刀人……这些正是构成今日乡村的一块块拼图。梅洁的《迁徙的故乡》写自己的家乡丹江口库区拆迁中乡亲们种种不舍，他们要告别的不仅是一个村庄，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熟悉的心境。王巨才的《草原，恩重如山的摇篮》写出了草原与牧民的生生不息，相互影响。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精神，对今天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很有启示性意义。安宁的《走亲戚》、钟翔的散文集《故土情》、陈霁的《夺补河两岸》等，从不同侧面描绘着乡村的面貌。

人物散文以人物为描绘对象，表达的是最真挚的情感。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感，在特定时刻会勾引起回忆，形成文字。阎晶明的《一个人和一种命运的逝去》怀念导师黎风先生，一位人生充满曲折而内心平静的学者；朱鸿的《不能想的父亲》、李云迪的《最温暖的一片阳光》、蔡崇达的《母亲的房子》写自己所理解的父母，陈原的《去了高原的兄弟》记述一位朋友与西藏高原的不解之缘。对生活的诗意书写是散文创作的一大特色。杨扬的散文

集《母亲的大碗》、乔叶的散文集《走神》、魏平的散文集《时光里的珍珠》、葛水平的《服饰的活性和通达》等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精心的体味，发现生活中的艺术因子，写出生命的温暖和价值。董桥的《养字》、胡竹峰的《墨迹》、耿占春的《隐形书写》、李琦的《发荣》、王祥夫的《清坐》、王族の《歌声与微笑》、尔容的《爱东湖的第一百零一个理由》等表达艺术滋养生活的情致。简平的散文集《在云端》、李晓君的《敞开的私人生活》、罗伟章的《发现自己——写给儿子的信》、周晓枫的《禽兽》、韩浩月的《饥饿是种深刻的记忆》等分享个人感悟，真诚而透彻，感人至深，引人深思。

还有一类作品书写个人记忆，也写出了一代人的生活况味。杨沐的《老母土》写祖母、母亲以及自己三代女性的生活遭际，是一种寻根式的写作。南丁的《下营》回忆作者一家人在下营村下乡的一段生活。邓友梅的《我走过的道路》和丁帆的《那年我的朝内大街166号》可以看到老一辈作家的养成，那些散散发着热情与才华、勤奋与谦逊的作家故事，能让人学到很多。宁肯的《一个人的道路——我的自述》写自己的童年与成长、与写作的渊源，可以看到新一代作家的成长轨迹。

理论评论的发展与意义

与此同时，2015年有几篇关于散文写作的理论评论文章值得关注。陈剑晖的《“非虚构写作”与散文的审美性》探讨“非虚构写作”潮流对散文创作的影响，一方面肯定了“非虚构写作”淡化了以往报告文学作品过于意识形态化、新闻报道化和人物故事过于程式化的弊端，又匡正了近年来散文写作中愈演愈烈的“自说自话”、背向现实的个人化写作倾向，对文学创作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与传统散文写作相比，“非虚构写作”也存在散文性的不足或审美性的淡薄。文章强调，散文的本质应是兼具审美与纪实两个维度，并且应有文体规范。

傅书华的《呼唤客体散文的写作》提出散文写作似乎陷入了一种瓶死，样式单调、题材趋同，缺乏独特的审美力量，其根源是散文作者同外部世界的沟通出了问题。这样的写作不是用作者原有的或者预设的态度和观念来形塑、评判自己所写的对象，而是去熟悉、去了解并在情感上亲近时代新出现的创作对象，从对象中汲取营养，重新构建自身，形成对自身和描写对象更为深刻的再现。

